

曲阜师范大学 2007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

学科、专业名称: 影视艺术学
 考试科目名称: 影视批评学

注 意 事 项	1. 试题共 <u>2</u> 页。
	2. 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, 写明题号, 不用抄题。
	3. 试题与答题纸一并交上。
	4. 须用蓝、黑色墨水笔或圆珠笔作答, 字迹清楚。

一、简答题 (共 3 题, 每题 10 分, 共 30 分)

1. 比较蒙太奇与长镜头手法。
2. 电影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区别。
3. 类型电影的主要特质是什么?

二、论述题 (共 2 题, 每题 30 分, 共 60 分)

1. 试论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主要风格特征, 并举例说明这一电影流派对
中国新时期电影的影响。
2. 简论目前流行的影视批评的主要模式的优势与不足, 并对王家卫的
电影风格进行文化批评。

三、材料题 (共 2 题, 每题 30 分, 共 60 分)

1. 根据以下材料, 写一篇不少于 500 字的评论。

(1) 国际电影节对第三世界电影人而言, 其语义是悖论的。一方面, 世界舞台向他们允诺了海洋般的资金潜力, 而且, 进入世界电影史的梦想也无比激动人心。但另一方面, 国际电影节对于第三世界影人来说, 也可能是一种“收编”和“围剿”, 换句话说, 戛纳、威尼斯、柏林等电影节以其悠久的传统和至高的荣誉垂钓着慕名者, 西方意识形态、外国观众的口味、各大评委的眼光不可能不进入。自从陈凯歌的《黄土地》和张艺谋的《红高粱》被西方媒体读解成“神秘的东方爱情故事”, 最先获得了国际电影节通行证后, 中国电影就开始大规模地“走向世界”; 而“世界”也没有辜负中国影人的一张张明信片,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、《秋菊打官司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我的父亲母亲》到最近的《小武》、《车站》等, 都纷纷盼得了佳音。但是, 国际电影节向我们订购的明信片是有规格有尺寸的, 就像著名影评人加布利耶尔说的: “西方世界向第三世界选购的电影是很容易甄别的, 它们常含有下列元素: 民俗, 但需浪漫; 苦情, 但需诗意, 现实, 但需幽默……”

(2) 真的, 连续的三届威尼斯小金狮都被第三世界人民牵走了: 第 56 届, 张艺

谋的《一个都不能少》让一个中国的乡村少女跑啊跑跑跑跑到了领奖台上；第 57 届，伊朗的《圆圈》让 8 个伊朗女性的本土遭遇激动了所有评委；第 58 届，《季风婚宴》让一对印度新人抱走了小金狮。而更意味的是，这些获奖导演在领奖台上，几乎无一例外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：我的电影是献给祖国人民的，祖国是我的创作灵感……比如，去年，声音失控的杰法·帕纳喜就在领奖台上哭泣着说：“我来自伊朗，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……那里的人民热爱生命，正是他们启发我拍了这部电影。”随后，受了哈佛“致命教育”的米拉也这么说。

当然，我们无权质疑这些伟大导演的一片赤诚，只是，在昭然若揭的国际电影节和第三世界的关系中，我们也许有权提醒自己的电影肖像，如同马丁·路德·金在很多年前提醒他的同胞时说的：“他们给予的赞扬是危险的。”

(3) 你无法不相信这种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歧视：在英文词典中，作动词用的“上海”充满贬意。Shanghai 意味着“诱拐和胁迫”，意味着“用酒精或麻醉剂使人失去知觉而把他劫到船上去服劳役”。1909 年，美国拍了一部电影叫《Shanghaied》，后来以同样的题目命名的影片在电影史上不下十部，内容多是有关绑架和诱拐的——查尔斯·卓别林 (Charles Chaplin) 1915 年主演的《Shanghaied》，也是一出关于诱拐的谐剧。

2、分析以下影视批评现象。

电影《红高粱》一出，立即引起纷纭评论，评论家的看法主要如下：

(1) 生命意识的张扬。吴予敏在《燃烧的民族生命的象征》一文中认为：“《红高粱》给人心灵上的冲击，真是难以言状。”认为那场野合“以神圣庄严的情感，将性爱拍成一组生命的典礼，人性的升华的象征……这是一个多么辉煌的人类学哲学的主题。”它“铺展成一幅生命的神话。”

(2) 反传统意识的外显。《电影评论》1991 年第 3 期载文《张艺谋的三部电影同一题材——通奸》，认为那野合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“通奸”，却被赋予了一种“大无畏”的“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改革精神”和“热烈追求理想”、“对旧有不合理制度的反抗”精神。该文还指出，在张艺谋的作品中，“男女通奸成了必然的元素，通奸更是剧情推进的一个关键。”

(3) 鼓吹法西斯主义。钱海毅的《磁感效应——漫话流行电影的灵魂》一文（《文艺报》1993，1，30）指出：“它的意识形态观念中，却有一种关于生存法则的强权逻辑，因为是‘我爷爷’救了‘我奶奶’，所以他获得了‘野合’的权利，甚至能杀死‘我奶奶’的合法丈夫，赶跑‘我奶奶’的另一个情夫罗汉大叔，独占‘我奶奶’。这说明强者才能生存，弱者只会被蹂躏。影片的后半部分日寇侵略中国其实也是对此的强调。”王一川在《〈红高粱〉与中国意识形态氛围》一文中以更为明确的语言指出，《红高粱》表达了一种法西斯主义。这种观念在于影片拍摄及放映前后的中国意识形态氛围之中。